

[田野调查与研究]

记忆为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 滇南边境多民族移民村的集体记忆

肖佳怡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集体记忆是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资源。生活在西南边境上的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中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滇南胶厂村的各民族在集体化时代的建村记忆体现了各民族休戚与共的生活经历,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基础;在对抗外来侵略时的卫国记忆弘扬了各民族生死相依的爱国精神,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联结;在生产合作中的富民记忆彰显了各民族和衷共济的认知观念,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由此可见,集体记忆整合了西南边境村寨中各民族共同的生活实践与精神追求,强化了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民族村寨;西南边境

10.16023/j.cnki.cn64-1016/c.2025.04.014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1079(2025)04-0111-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以来,其理论内涵不断丰富与发展。2017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这不仅标志着其成为指导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核心理念,也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此议题的广泛关注与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归属感、荣誉感”^{[3]5}。当前,学界从概念

收稿日期:2025-09-28

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2025年“揭榜挂帅”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近现代西南民族区域研究”(XNZZSH2503);四川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2025年“揭榜挂帅”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地区民族文化建设”(CSDZL25-31)。

作者简介:肖佳怡,女,湖南长沙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内涵^[4]、理论渊源^[5]、基本特性^[6]、实践路径^[7]等维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理论探讨。我国地域广袤,不同区域间存在的显著差异决定了在实施民族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地域的复杂状况^[8]。边疆地区的民族构成具有多元性,因此在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为必要。鉴于此,在边疆地区大力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9]、深度挖掘并保护开发红色文化资源^[10]、全力推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11]等宏观举措屡被提及。然而,部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各民族在共同生活的社会文化空间中所发生的历史互动与交往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集体记忆。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社会建构的过程,“正是在社会中,人们才能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12]69}。虽然深受社会决定论的熏陶,但哈布瓦赫也强调真正具有记忆能力的主体是作为群体成员的每一个个体,也就是说“群体的集体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实现的”^{[12]71}。若是将集体记忆视为“超越个人的客观符号或深层结构的概念有可能陷入群体思维的形而上学,符号与深层结构只有在个人将其视为真实或在实践中时才是真实的”^[13]。换言之,作为记忆承载主体的历史亲历者,能够“将宏大历史具象化”^[14]。社会构建的宏观框架与个人独特的观察视角在无形中实现了有机融合,共同塑造并维系着集体记忆^[15]。集体记忆所兼具的社会建构属性与个体认知属性所赋予的理论弹性,使其得以在宏观历史脉络与微观经验叙事之间构建起分析桥梁,进而成为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可资运用的中层理论^[16]。作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关联。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成员通过文化实践与社会互动构建起以共同命运为内核的“记忆之场”^{[17]23}。通过共享群体起源叙事、重大事件经历和文明发展脉络,中华民族的成员们构筑起跨越时空的精神联结。因此,集体记忆不仅是文化传承和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更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基础”^[18]。但是,集体记忆本身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若是不对集体记忆的叙事框架加以理解,不去复现、回忆集体记忆,那么集体记忆很有可能会转变为“集体失忆”^[19]。因此,有必要通过历史教育、文化符号以及仪式活动,有效地激活集体记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20]。

集体记忆的形成与储存依赖特定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空间。无论是单一民族村寨,还是多民族杂居村寨,存续至今的村寨均是西南边境上各民族所共有的生活空间,承载着他们的实践经验与集体记忆^[21],成为西南边疆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单元。笔者通过对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胶厂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尽管胶厂村中生活着傣族、瑶族、汉族、彝族、苗族5个民族,且各民族成员源自不同地域,但村民们却展现出超越单一民族认同的身份建构倾向,形成了“我们”胶厂村人的集体观念。此外,各民族村民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等重大历史事件均保持着高度一致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共同体现象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弱化形成鲜明对照,揭示了胶厂村存在超越民族界限的社会整合机制。胶厂村隶属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水河镇金水河村委会,距离国境线约1.5公里,面积为1.04平方公里,海拔约为320米,年平均气温22℃,年降水量20毫米,适宜种植橡胶、玉米、木薯、甘蔗、香蕉等农作物。村民生计方式以种植橡胶、外出务工、边境贸易为主。胶厂村为多民族杂居的移民村,村寨的移民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6—1978年为第一批村民搬迁落户时间,当时金水河大队在如今胶厂村所在的位置成立金水河联办胶厂,然后从其所管辖的9个生产队中抽调12户村民迁入此,让其共同建设集体的橡胶事业,于是在此地新设立了“胶厂生产队”。这12户村民分别为来自金水河生产队的傣族6户(一队、二队、三队每队各2户),来自曼棚生产队的傣族1户,来自半坡生产队的苗族1户,来自平安寨、白石岩生产队的瑶族各1户,来自隔界生产队、八家生产队的哈尼族各1户。这批移民中目前仍然居住在胶厂村有14户。1982年至今为第二批搬迁落户阶段。此阶段多是因务工、分户等原因自发迁入胶厂村的村民,共有14户。目前,胶厂村户籍登记在册的村民共有28户110人。

胶厂村最初是由制度力量统合而成,来自各个生产队的傣族、哈尼族、瑶族、苗族群众来到同一个地理空间相邻而居,秉持着集体主义的精神,共同为集体橡胶事业而奋斗。而如今,各民族在村寨中依然能够经济

相依、情感相亲、文化相融,不会刻意强调民族之间的边界,展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在此过程中,胶厂村村民有着共同的经历、相似的遭遇,亦共享着相同的集体记忆。可以说,村寨是生活在西南边境上的各民族相互嵌入、彼此交融的生活场域。他们在村寨中开展生产生活、进行交往交流,共同形成了属于村寨全体成员的集体记忆。这一集体记忆不仅是他们共有的精神家园,也是他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极具生活气息的思想资源。

二、休戚与共:集体化时代的建村记忆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们往往拥有共同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共享着对于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在胶厂村集体化的实践过程中,国家意志塑造的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彼时村民的个体行动与意义生产方式。当个体被编入生产队组织时,其作为集体劳动者的社会角色得以被强调,在特定历史阶段超越了民族身份的属性。这种身份转换不仅体现在劳动分配制度中的集体优先原则,更通过日常实践中的生产活动,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的价值准则内化。

(一)从无到有的共有家园

家园是栖居于天地之间某个地方、有着相对稳定生活方式的每个人所共有的生活世界。^[22]1976—1978年,胶厂生产队作为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项目,从一片荒芜之地变为各民族混居的共有家园。在金水河生产大队的政策动员下,12户移民家庭响应“勒紧裤腰带干活”的时代号召,通过集体协作的劳动实践,垒上一砖一瓦,种植一草一木,逐步将“胶厂生产队”从政策话语中的概念性存在转化为具有生活实感的物质空间。移民初期,他们以近乎白手起家的状态进入胶厂生产队,依靠搭建简易茅草竹楼实现遮风避雨,并依赖采集山间野菜野果维持基本生存。后来,胶厂生产队于1981年开始定植橡胶,在1981—1983年的这三年里,由各户人家原属生产队提供每人每年500斤谷子,村民们的粮食问题得以解决。年迈的村民罗岑莺^①回忆了其搬迁后的生活状态:

我们那时住的茅草竹楼特别简陋。夏天一家人挤在屋里特别闷热,晚上经常热得睡不着,到了冬天屋子又不挡风。开始还经常挨饿,我们的田都在原来的生产队,搬过来这边就只能靠吃点山里的野菜,有时饿得胃绞痛,小孩都太瘦了。(访谈对象:罗岑莺,女,78岁,傣族,胶厂村村民;地点:胶厂村;时间:2025年2月14日)

这一生活体验和身体感受几乎刻写在每一位建设胶厂生产队的亲历者身上。他们对那段日子的共同记忆,既包含了其在物质层面的匮乏体验,也折射出其在集体化时代所经历的生存适应过程。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一种物质现实,比如一尊雕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12]335}。从物质层面来看,一间间简陋却相对聚集的房屋与一排排细长瘦小的橡胶树苗,都是胶厂村村民对于那段历史的深刻印象。与之相伴随的是,亲历者们及其后代通过对那段记忆的讲述而强化了他们的群体身份认同。

(二)建设胶林的同甘共苦

金平县的橡胶产业最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国营金平勐拉农场开始大规模种植橡胶,400多名从部队转业复员的官兵在勐拉坝开垦土地、种植作物,用10年的时间将橡胶种植面积从3亩推广至7677亩^{[23]124}。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基于扩大橡胶发展、稳定边疆的考虑,提倡以集体经济的形式来发展民营橡胶。这一制度性变革通过生产资料共有、劳动协作等形式,突破了以往国营农场对橡胶产业的垄断格局,将橡胶种植权下沉至村寨层级^{[24]26}。

1978年10月2日,金水河联办胶厂在胶厂生产队成立。金水河联办胶厂实质是金水河生产大队在集体所有制框架下的经济实践产物,属于金水河大队社队联办企业。金水河联办胶厂形成了“村厂一体”的治理结构,由时任胶厂生产队队长兼金水河联办胶厂厂长的陈望忠担任核心管理者,由当时胶厂生产队的所有队员担任生产者。建厂之初,全厂共有38个劳动力,按照每个劳动力管理300棵橡胶树的原则,胶厂生产队全

体队员通过三年的时间,最终种下了约8000株橡胶,按照每亩25株计算,约合320亩^{[25]30}。从西双版纳某国营农场购置橡胶树苗以后,胶厂生产队派出技术员刘逸强去往勐拉镇的橡胶公司学习技术,回来后通过示范操作、现场指导的方式将技术传授给大家,以开展林地规划与开垦定植活动。

橡胶生产从种植到抚育的各个环节,都依赖精心管理,任何一环节的疏漏都直接影响最终产胶率。对于橡胶这一新引进的作物,胶厂生产队高度重视,种植过程严谨有序。前期选择排水良好、土层深厚的缓坡地,在厂长外出购置种苗的同时,队员清理场地、翻耕整地,开垦出种植平台。定植通常在雨季初期进行,以利用土壤湿度提高成活率。种植时按株行距挖穴,施入基肥后植入幼苗,覆土压实并浇透定根水。种植后除雨天外每日浇水一次,并定期清除林内杂草,避免争夺养分。早期多采用人工锄草,后期逐渐使用农药“草甘膦”,每年两次。此外,依据橡胶树生长阶段与土壤肥力合理施肥:第三年在农历三月和十月雨季各施一次尿素,之后每年仅在农历三月施用一次,直至第六年进入割胶期。

在亲历者们的口述中,“苦”是他们对于种植橡胶那段时光最深刻与最普遍的记忆符号。童媚卿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亲历者,谈到种植橡胶的岁月时,她说:

种橡胶的苦只有我们那一辈人才知道,夏季我们这里能够达到38℃,每天天还不亮就起来干活。每棵树每天都得浇水,那时没得自来水管,苦得很,从河边背到山上,衣服全被汗水浸湿,你想想,光爬山就很累了,我们还要挑水桶弓着腰上山好多趟。(访谈对象:童媚卿,女,76岁,傣族,胶厂村村民;地点:胶厂村;时间:2025年2月20日)

在访谈资料里,叙述当年种植橡胶的“苦”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是亲历者们诉说那段历史的起点。在他们口中,“苦”大致有以下三种含义:第一,“苦”并不是个人的独特经历,而是全队人所共有的,是整个群体在那个年代的共同境况;第二,“苦”能历练出一种生活品性,即“不怕吃苦、顽强拼搏”;第三,“苦”体现了个人以集体利益为重,达到忘我、无私的境界。正如刘亚秋所言:“当‘苦感’作为一种情绪,作为一个群体可以共享、可以引起共同的身体感觉的符号时,‘苦’的含义就变大了。”^[26]当村内各民族村民谈论起当年的“苦”时,“苦”的事件、情境似乎已经不重要了,仿佛大家都能瞬时共鸣到那段记忆中去,他们通过“苦”的身体记忆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认同。

可以说,胶厂村村民的建村记忆为他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了鲜活的叙事基础。在制度力量的统合安排下,不同人群突破地域界限聚居于此,历经数代人的共同生活与协作劳动,形成了深度交融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跨越族际边界的集体实践,催生出独特的认同体系,它既超越传统民族身份的区隔,将不同成员熔铸为共享建村记忆的命运共同体;又通过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在制度框架内完成了从村寨认同到国家认同的价值升华。这种双重认同机制呈现出一种交织关系:其根基深植于村寨建设的历史实践,村民们在共建村寨家园、开垦橡胶林的集体劳动中,创造了超越血缘纽带的新的联结方式;其升华则体现在对国家发展理念的认同,当个体生命轨迹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产生共振,对集体成就的荣誉感便转化为对国家体制的归属感。这种从具体实践到抽象认同的转化过程,本质上实现了微观个体记忆与宏观国家叙事的同频共振。

三、生死相依: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卫国记忆

从情感维度看,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依附表现为多层次的认同体系,既包含对文化根脉的溯源性情感皈依,也涵盖对集体成就的荣誉共享意识,更体现为在跨文化比较中自觉维护群体尊严的责任感^[27]。当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全体成员集体经历共同的重大危机事件时,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统一性和凝聚力会得到显著增强,而这种凝聚力通过代际传递与文化实践不断被强化,最终具有韧性的精神共同体得以形成。

(一)普通百姓的生命体验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云南、广西边境对越南发起了自卫反击战。短短一个月

间,从参战士兵到当地百姓,身处中越边境的无数人参与并见证了这段历史。1978年秋,奉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黎笋集团,把中国人民视为眼中钉,把枪口转向曾为越南民族解放作出过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越军不断向金平县边境地区开枪开炮,射杀中国居民甚至武装侵入中国领土,绑架正在劳动的边民,偷杀耕牛家畜,埋设地雷,炸死炸伤边民和牲畜。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之前,边境地区已呈现出明显的战争征兆,身处边境一线和普通百姓早已嗅到了战争的气息。1978年12月,越军向金平县勐拉区的隔界村开枪射击千余发^{[28]47-48}。该事件作为战争信号,迅速扩散至周边区域。胶厂村村民罗红樱讲述往日情形时说道:

当时我们听到了炮弹在地面炸开的响声,见到了好多离开隔界村躲避战争的人。隔界村的人对我们说:“越军老是朝寨子屋顶上放黑枪,故意炸死我们的猪和牛,我们要逃命。”(访谈对象:罗红樱,女,76岁,傣族,胶厂村村民;地点:胶厂村;时间:2025年2月13日)

胶厂村附近也时常会遭到越军炮弹的攻击,硝烟弥漫在整个村寨里。一时间,村寨内的村民们惶恐不安,惊慌中或挥铲挖掘猫耳洞,或悄悄巡逻以及时获取战况消息。大众传媒的舆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集体焦虑。村民们通过报纸、广播持续关注着两国关系的恶化进程,感受到国际政治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冲击着他们的生活。面对越军的蓄意挑衅,《人民日报》于1979年2月17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文章,对全世界宣告:中国的最后选择是“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给越南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有效地保卫了祖国边疆。战事的愈演愈烈,让胶厂村村民的紧张情绪不断扩张,但与之相伴随的是各民族想要保卫祖国热情与血性,越军的侵略行为激发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想要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可以说,战争唤起了各民族作为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认同,使得他们能够站在国家的立场一致对外。

相较于部分官方主导的记忆工程,民间记忆往往蕴含着更为鲜活的生命体验。深入挖掘民众对战争经验的微观记忆,不仅能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更能激发社会成员对历史传承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胶厂村的村民们时刻将自己的边民身份挂在嘴边,在陈述共同御侮的经历时体现出他们对于边民守卫国家领土之义务的履行。可以说,对越自卫反击战集体记忆的重构性回溯,为人们提供了审视历史的棱镜,使其更加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所在。

(二)军民一心的团结佳话

在边疆危机引发的社会动员场景下,金平县各民族开展了积极的卫国实践。为了支援边防部队,金平县各族人民踊跃支前参战,各族同胞热血沸腾,同仇敌忾。支前马帮队和担架队迅速组建,前者负责向阵地持续输送物资,后者则专注于救死扶伤的医疗支援工作。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段,军民之间构筑起坚实的共御外侮同盟。即便未编入民兵序列的普通民众,亦通过地形引导、物资输送等形式支援军队,造就了一段军民团结的佳话。

据胶厂村村民回忆,战争爆发时有一边防部队驻扎在胶厂村隔壁,军人们来自湖南、江西及云南昭通和西双版纳等地。村民们会将鸡肉、红糖、鸡蛋等物资支援部队,帮军人们缝补衣物,积极救治伤员。部分男性村民还会协同驻军巡逻放哨,利用自己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为军队带路。若是战事升级到十分危急之时,军人们会疏散村民,将他们带领至距离边境线3公里左右的安全地带,位置大概在纳窝村附近的一个天然石洞。为躲避战火,村民们到纳窝村短暂住下,军人们则回到胶厂村,借用已有的房屋和掩体进行防御。回忆战时的往事时,毛淑花说:

1978年底,我们家才搬到胶厂村不久,经常有炸弹从天上掉下来。战况太危险的时候,我们就被军人带到后方,原来的房子都是他们部队在住了。我们这边的军人都是用心爱民呢,打仗的时候为了保护民众真的是牺牲了好多人。(访谈对象:毛淑花,女,79岁,傣族,胶厂村村民;地点:那发街;时间:2025年2月17日)

边境的村民们通过物资援助、日常巡逻等实践,实质上构建了“军民融合”的防卫网络,成为国家边防体

系的重要补充。中国军民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共同参与、团结合作,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力打击了越南侵华的野心,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军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家认同感。在面对外来的入侵与挑战时,边境一线的村民们主动支前、积极抗战,展现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和坚定的国家意识。

以上保家卫国的记忆叙事,一方面既是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来侵略之历史事实的印证,另一方面也能够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竭的精神源泉,使其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一代代中得到传颂与弘扬。通过对战争记忆的叙述与重复,各族群众在“中华民族”“中国人”的集体身份标签下获得了意义归属,引发命运与共、生死相依的情感共鸣。

四、和衷共济:超越民族利益的富民记忆

在边境这一特殊地域,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跨民族经济合作构成了各民族群体成员间最核心的社会联结方式^[29]。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当地各民族的经济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其民生福祉,更关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巩固。当边民切实享受到现代化发展成果,在物质生活条件持续改善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便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个人命运、民族发展与国家繁荣的内在联系,从而自发地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一)胶林重建时的“换地”经历

1980年,金平县开始在全县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时,胶厂村村民从原来所属的生产队分到了田,但林地归属在胶厂村集体。1986年,当第六个年轮的橡胶树迎来首次采割季,胶厂生产队将收获的生胶售予金平农场三队后,所得收益需按三级分配机制流转:首先提取30%反哺原属生产队,各个生产队再从提取的收益中抽取10%上缴金水河乡^②。经过层层分配,每户家庭最终获得3000元左右的可支配收入。这在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元的年代,已属难能可贵的经济积累。至1988年,随着国际市场胶价上扬,队员分红迎来首次跃升,户均年收入突破万元,各族村民真切感受到“苦难与共”后所带来的“苦尽甘来”。到了2002年,橡胶树自开割已过去16年,其出胶率明显下降,收益也随之降低。因此,经过与各级政府的协商,胶厂村村民砍伐了曾种下的所有橡胶树,将所有树木一次性卖给外地的木材老板,并将卖得的收入按40%提留给各户人家原属生产队,其余60%的收入留给胶厂生产队分至各户。在此之后,村民想要划分林地的意愿日益高涨,强烈希望通过家庭经营的方式来扩大橡胶种植规模。胶厂村小组便将林地划分至各家,安上树桩,划好地界,交由各家自行处理。分地以后,金水河联办胶厂也随之不复存在。

2002年胶厂村小组在分配林地时,为了确保公平,采取分散分配的原则,使每家每户都能分到部分“好地”和“差地”。村民对“好地”和“差地”的评判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林地距离村寨的远近,二是土地肥力的高低。在种植胶树之前,村民之间会交换部分林地的使用权。这种交换行为主要基于生产效率的考量:当胶树分布过于分散时,每人每天仅能割胶约100棵,且劳动强度较大;而胶树相对集中时,每天生产效率可显著提升至200至400棵。在土地交换过程中,一种交换方式是以土地换土地,这多数发生在两家对将要换回的土地均比较满意的情况下;另一种交换方式是以金钱或物资换土地,这是由于提出交换土地的一方并不能提供让对方满意的土地,对方的交换意愿不强,因此提出换地者会通过现金或物资补偿的方式来促成交换。陈建国谈到自家的换地经历时称:

我家在河对面山顶上有块地,才有12棵胶树,那块地太远了,要爬1个小时才能爬到。当时,盘承禄(瑶族)用2只公鸡,我就同意换了。与其让那块地半荒在那,不如换给他家去割。(访谈对象:陈建国,男,52岁,傣族,胶厂村村民;地点:胶厂村;时间:2025年2月19日)

胶厂村各族村民通过互相“换地”来优化林地分布,使原本分散的土地变得相对集中,从而提高了橡胶种植和割胶的效率。这种效率的提升并非单方面的获利,而是通过合作使整个村寨的生产能力得到提升,最终让各民族家庭都能从中获益。如今村民们对“换地实践”之集体记忆的回忆与叙述,既彰显了村寨中各民族在历史上的生产合作关系,又巩固了当下村寨内部的族际团结,展现了多民族村寨在资源管理上的地方智慧。

(二)寨内族际间的“雇工”叙事

农业雇佣合作作为农民合作的重要模式,实质上是在乡土熟人网络中开展的农业生产性劳动力组织方式,这种合作关系兼具经济与价值功能^[30]。通常情况下,胶厂村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分配能够满足橡胶林的日常管理需求,例如施肥、除草和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然而,到了割胶期(农历三月至农历十一月),劳动强度大幅增加,单个家庭往往难以独立应对,对于超出自家劳动能力范围的区域,则会雇佣工人进行割胶。

在村寨的第一批移民中,几乎每户家庭都拥有需要管理的橡胶林。由于割胶作业的高频率(每隔1天割1次)和特殊时段(夜间23点至次日6点),村民很难再额外参与村寨内的“换工”互助。这一劳动力缺口恰好由后来迁入、没有橡胶地的村民填补,他们通过受雇的方式参与到橡胶产业中。胶厂村苗族村民杨小宝受雇于傣族雇主陈建国的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杨小宝老家位于金平县铜厂乡董棕河村,1999年开始在金平农场十四队做割胶临时工,2007年来胶厂村在陈建国家做长期的割胶工人,便在胶厂村建了一简易的瓦房用于居住。陈建国于2017年低价转让一块宅基地给杨小宝,随后杨小宝在此建造砖混结构的平房,并于2018年正式落户胶厂村。他回忆道:

我有四个兄弟,老家田地少。我成家后分到的地不到1亩,一年里种的稻谷只能装满8个蛇皮袋,一家人根本吃不饱,我就出来打工。从1999年起,我在金平农场十四队待了9年。农场的人割胶很专业,我就边看边学边练。那时一个月只挣500元,不管割多少,工资不变,所以我后面才会来这给陈建国割胶。他只雇我们夫妻俩,因为我们不会把橡胶树割伤。在陈建国这里,我们收入是对半分。他家有上千棵橡胶树,我和我老婆一天能割700多棵,现在每人每月能挣4000元左右。(访谈对象:杨小宝,男,58岁,苗族,胶厂村村民;地点:胶厂村;时间:2025年2月21日)

一般而言,雇工薪酬支付主要采用两种模式:一是固定月薪制,雇主按月支付工人确定金额的现金报酬;二是收益分成制,雇主与工人按橡胶收益的一定比例进行分配。胶厂村普遍采用的是后者,工人可获得橡胶收益的40%~50%作为劳动报酬。这种分配机制使得劳资双方共同承担橡胶种植的市场风险。这种收益共享模式与“道义经济”^[31]¹³的基本原理相契合。通过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关系,雇主与雇工构建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与心理层面的情感依赖不同,这种族际合作模式具有显著的实践性特征:一方面切实改善了村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升了整体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共同的经济活动构建了“共富共荣”的集体记忆,使“共同发展”的价值理念内化,从而巩固了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

胶厂村的发展模式生动体现了各民族共同把握发展机遇、携手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要求,充分彰显了民族团结进步、协同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在村寨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协作与利益分配机制,构成了当代边疆多民族村寨独特的社会联结方式,使得各民族村民逐步培育起和谐与稳定的民族关系。而各民族村民对上述富民记忆的刻写与整合,促使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共享价值、共通情感、共同利益、共有身份”^[32]的共生关系。

五、结语

本文试图从集体记忆的视角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进路,选取云南省金平县胶厂村为个案,从胶厂村各民族所共有的建村记忆、卫国记忆与富民记忆这一脉络深入分析了集体记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艰难岁月的建村记忆唤醒各民族对于共建家园、集体劳动经历的追溯,复现各民族在集体化时代的共同经历,实现村寨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共御外侮的卫国记忆激发各民族对于自身境遇和国家命运的审思,能够强化中华民族身份,锤炼中华民族精神,厚植中华民族底气;互利共赢的富民记忆巩固各民族互嵌式生计结构,通过生产合作与利益共享,创造超越群体边界的社会联结机制,激活各民族共创美好生活的主体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巩固离不开群体共享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的激活与复现,是西南边疆民族在村寨场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媒介。集体记忆体现了一种公共关怀,它超越了血缘和族

别的限制,培养了群体成员的责任感和互助团结意识^[33]。诚然,国家力量的存在为西南边疆民族从村寨认同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提供了关键条件。但是,胶厂村的集体记忆并非是一个完全来自外部的、经由权力操控的结果,而是一种自然的、内发的实践。胶厂村各族村民对集体记忆的叙述,让他们相互之间产生了亲密感与对国家的归属感。质言之,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产生于国家在场的背景下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凸显了各民族在历史互动中的共同性,是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文化纽带。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传统史学研究,口述史料常因所带有的主观性、片面性和不确定性而备受争议,但口述历史的独特价值并非在于其记录的客观准确性,而在于它反映了叙述者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感知、理解和生活体验,以及基于这些经验所形成的判断与行动^[34]。口述资料往往比官方文献展现更加立体多元的历史面貌,可以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史与中国社会的宏大历史叙事联系起来,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35]。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集体记忆的既有研究,往往从中华民族宏观的发展历史中构建集体记忆的谱系,却忽略了集体记忆的质感、细节与场所。而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对西南边境民族村寨之集体记忆进行挖掘与记录,可以呈现富有生命力的微观叙事,进而帮助人们更真切地体会、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形成历史。

注释:

①出于田野伦理要求,已对文中出现的所有人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②1983年,金水河生产大队改名为金水河乡,1987年改名为金水河村公所,2000年改名为金水河村委会。

参考文献:

- [1]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9-30.
-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 [3]本书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
- [4]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6).
- [5]闫丽娟,李智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渊源探析[J].广西民族研究,2018(4).
- [6]郝亚明,秦玉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内在需求、基本特性与实践方向[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
- [7]冯雪红,张冰青.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探赜[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
- [8]马燕,罗雪凝.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生计变迁与族际互动——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为例[J].民族学论丛,2022(4).
- [9]何生海.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6).
- [10]梁海凤,朱新武.红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耦合、多维功能与实践路径[J].民族学论丛,2023(2).
- [11]赵心愚.教育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民族学刊,2021(2).
- [12]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13]Jeffrey K. Olick.Collective Memory: The Two Cultures[J].Sociological Theory,2002(3).
- [14]胡洁.基础、生成与建构:从社会记忆到社会认同[J].天津社会科学,2020(5).
- [15]周晓虹.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J].天津社会科学,2020(4).
- [16]何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J].西北民族研究,2023(1).
- [17]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 [18]麻国庆.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J].西北民族研究,2022(1).
- [19]郑宇.集体记忆的构建与演化——管口村哈尼族“集体失忆”的阐释[J].思想战线,2008(3).
- [20]黄彩文,李爽.历史记忆、仪式实践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滇西地区邓子龙信仰研究[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
- [21]杨浏熹.乡村振兴视域下西南民族村寨的保护与活化[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 [22]李晓非,朱晓阳.作为社会学/人类学概念的“家园”[J].兰州学刊,2015(1).

- [23]李涛.话说红河·金平[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 [24]欧阳洁.橡胶种植与阿卡社会继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25]刀洁,和少英.守望国境线上的家园——金平傣族的社会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 [26]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J].社会学研究,2003(2).
- [27]王楠,王延隆.书写、场域与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记忆[J].青海社会科学,2022(3).
- [28]金平县概况编写组.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概况[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
- [29]王瑜,马小婷.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实践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
- [30]卢克玲.农业雇工合作与村庄秩序再生产——基于豫南白村的经验[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
- [31]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32]郝亚明.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 [33]李少霞,魏莉,岳喆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记忆维度——基于集体记忆历时、共时、即时的三重时序构建[J].广西民族研究,2024(4).
- [34]周海燕.个体经验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口述史研究的效度及其分析框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
- [35]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驢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J].中国社会科学,2003(4).

Memory as a Medium: Collective Memory in Multi-ethnic migrant Villages on the Southern Yunnan B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g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XIAO Jiayi

(Yunnan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Collective memory serves as an ideological resource for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forg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thnic groups living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s have jointly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long-term practices of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Taking Jiaochang Village in southern Yunnan as an example, the memory of village establishment during the collectivization era among its multi-ethnic residents reflects the shared life experienc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weal and woe, laying the narrative foundation for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memory of safeguarding the motherland during the resistance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carries forward the patriotic spirit of all ethnic groups standing together through life and death, strengthening the shared destiny bond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he memory of enriching the people through production cooperation demonstrates the cognitive concept of all ethnic groups working in harmony for common prosperity, consolidating the valu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t can be seen that collective memory integrates the shared life practices and spiritual pursuits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villages of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s, enhances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forge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ollective memory; forg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multi-ethnic villages; southwest border

责任编辑:王玉强